



书院概说

ZHONG GUO
WEN HUA SHI
ZHI SHI
CONG SHU

书

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。书院之名始于唐中

叶贞元年间（公元 785—805 年）官方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，其职责为收集整理、校勘修订图书，供朝廷咨询，兼作皇帝侍读、侍讲，类似宫廷图书馆。唐末五代，读书士子多隐居避乱，读书山林，后发展为聚书授徒讲学，常以书院命名读书讲学之地，遂演化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。至宋初，形成一批颇有影响的著名书院，如白鹿洞、岳麓、嵩阳、应天府、石鼓、茅山等书院。南宋时期更吸收、借鉴佛教禅林讲学的制度，使书院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，经元、明而不衰，至清末，随着整个封建教育制度的衰败，近代新式学堂的诞生，古代书院才逐步改为学堂。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 1000 余年，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观。

书院一般是以私人创办或主持为主的，也

有家族、民间出资筹办的，多数得到朝廷和地方官府的鼓励和资助，或赐名、赐匾额、赐书，或赐银、拨田产，成为民办官助、民办公助的办学兴教的形式。

大多数书院是由名师大儒聚徒讲学发展而成的。主办者或主持人以书院为基地，研究或传布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和成果。书院也以著名学者的学术成果为主要教育内容。书院生徒多是慕名师来学，并将从师学习与个人学术志趣紧密结合，边读书、边学习、边研究。这就形成学术研究与读书讲学融为一体、相互结合、相互促进的独特教学方式和教育组织形式。

书院的师生多以醉心学术、潜心修炼心性为目标，因此多数书院反对科举，反对追逐名利，师生多数厌恶科举、淡泊仕途，隐居山林胜地，超然观世事，冷言论朝政，以清高脱俗、持志守节相标榜。经常与当权执政者的现行政策和直接利益发生矛盾。如南宋的朱熹书院讲授程朱理学，曾被列为“伪学”、“禁党”；明中叶王阳明在书院传授陆王心学，也被视为“异端邪说”；明末顾宪成、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，“讽议朝政，裁量人物”更被定为“东林党案”。东林书院

遭禁毁，并殃及全国书院。正因为如此，元代和清代，都曾对书院加强控制，使书院官学化，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，使之与官学一样，变成科举考试的附庸。

书院与各级官学既有互补的关系，又有异趣相峙的抗衡关系。一般说来，官学不兴，书院勃兴，弥补了官学数量不足。特别是朝廷无暇顾及兴学设教，无力兴办官学，往往鼓励、支持书院发展，书院成为满足士子读书要求，保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。一旦朝廷有可能集中精力发展官学，书院便被冷落。在千余年书院发展历程中，多次出现官学盛书院衰、书院兴官学败的交替互补的势态。由于官学更多地受到科举考试制度的支配和控制，务虚文、逐名利，造成官学弊端丛生，教学全无“德行道艺之实”，书院往往起而纠官学之偏、革官学之弊。官学与书院呈现出异趣相峙、并列抗衡的局面。

从总体上看，官学的课程和教学比较冗繁呆板，过于程式化，而书院的课程和教学比较简约灵活，师生有较多的主动性和自由度。毛泽东早年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，曾借鉴古代书院的办学传统，肯定书院课程简约、教学灵活，师生

共同研讨，悠然自得，师生感情融洽，远优于官学。

书院基本属于私学性质，但它不同于一般的私塾、社学、义学。可以说，书院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私学。书院的教学是以学术研究为主的，多数书院往往都是某一学派的活动中心或研究基地。书院既是学校，又是研究机构，同时还是一个学术团体。而一般私塾、社学、义学等多数是启蒙教育的性质，主要是识字、日用常识、基本伦理、行为规范的灌输和训练、应试备考的初步准备。在古代私学系统中，可以认为，一般私塾、社学、义学属初等教育或基础教育范畴，而书院基本上属于高等教育范畴。当然，有的时期，书院设置十分普及，有些书院也承担部分初等教育的职能，特别是一些家族式书院，即使如此，书院也与私塾、社学、义学有明显区别。

讲学和学术研究是书院主要的活动内容。讲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成为书院教育的突出特点，结合的方式灵活多样。通常由书院主持者主讲，每讲立一主题，称为明立宗旨，讲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，生徒边听讲，边质疑问难，形成讨论式教学。有时书院延聘不同学派的名

师来书院讲学，书院师生共同听讲，开展论辩，探究不同学派之异同。如：朱熹曾邀陆九渊至白鹿洞书院讲“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”。这种讲学方式发展成一种“会讲”制度 实际把书院讲学变成不同学派之间开展学术争鸣论辩的研讨会。如 朱熹与张栻〔shì 市〕在岳麓书院曾有“朱张会讲”。这种讲学方式，更进一步发展成“讲会”制度 各书院轮流主办 邀集其他书院师生共同讲论，当地官员、士绅、民众均可自由前来听讲，从而扩展为以书院为中心的地区性学术讲习活动 并且订立了完整的“讲会规约”有的范围波及数郡县，听讲者达一两千。如：明代紫阳书院讲会 订有“紫阳会约”东林书院讲会 订有“东林会约”等。这种方式 在南宋和明中叶十分普遍，几乎成为书院讲学的主要方式，对文化教育、学术思想、世俗民风产生过极大的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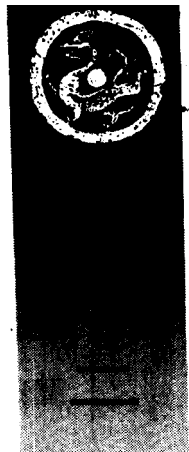
书院的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是开展祭祀活动。书院的祭祀同宗教祭祀或祖先祭祀有着重要区别。书院的祭祀活动着眼于教育功能，多数除祭祀孔孟等先圣先师之外，着重祭祀本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性人物，同时祭祀对本书院

创办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士。宣扬他们的事迹，牢记他们的学术旨趣，怀念他们的功德，为师生树立仰慕和仿效的典范，成为进行学派学术渊源和书院奋斗历程教育的好形式，形象具体生动 效果极佳。

搜集、收藏图书也是书院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。书院顾名思义，以藏书丰富著称于世，每个书院都成为当地藏书最丰富齐备的场所，许多书院专建藏书楼、藏书阁或书库，成为书院建筑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。书院的藏书活动既为书院教学和研究准备了充足的资料，又为当地士民、乡绅查阅、咨询提供了方便。不少书院还自行刊刻图书，书院主持者或主讲人的讲义和研究成果、书院生徒的听讲笔记、读书日记，经过整理，刊刻成书，既保留了教学科研的成果，又扩大了社会影响。现今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、珍本书中，就有不少是“书院本”。这种将图书馆、学校教育、研究机构集于一体的独特组织形式，对后世颇有启迪之效。

书院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已不复存在了，然而书院优良传统仍有极强的生命力。近代致力于教育改革、文化更新的不少人士经常热

心研究中国古代书院，从中吸取营养，寻找借鉴。近年更有创办新式书院的尝试。人们也许可以看到，书院这种古老的文化教育特有的组织形式，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

书院的起源

ZHONG GUO
WEN HUA SHI
ZHI SHI
CONG SHU

书

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，对中国古代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重要影响。书院教育的许多特点和积累的宝贵经验，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。近些年来，在中国教育史、中国文化史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。

书院的起源历来是书院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。几代学人曾以不同的学术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探讨，得出过不尽相同的认识和结论，对人们认识书院教育的本质特点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。

从中国教育史的角度探讨书院的起源，主要是需要探明具有讲学活动的书院起于何时。为此，很有必要对书院的性质和特点作出恰当的界定。根据现有认识，综合各家的研究成果，我们初步界定为：书院教育是指以私人创建或主持为主，收藏一定数量的图书，聚徒讲学，重

视读书自学，师生共同研讨，高于一般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。其中，广收图书、聚徒讲学为书院教育的本质特征。我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探讨中国书院的起源和书院教育发展史的。

1 书院之名始于唐

现有史料证实，最早使用书院之名的是唐代官府。清代学者袁枚在《随园随笔》一书中明确指出：“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，丽正书院、集贤书院皆建于省朝。为修书之地，非士子肄业之所也。”袁枚的说法成为书院研究者所公认的最权威的结论。这一说法肯定了两点：第一，最早使用书院之名者是唐玄宗时创置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；第二，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都是官府的修书之地，而非士子肄业之所，是官府皇宫的图书馆，而不是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。

丽正书院，也称丽正修书院，又称丽正殿书院。据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记载，唐玄宗开元五年（公元717年），在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，专设校定官四名。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则称，开元六年（公元718年）乾元殿改称丽正修

书院，专设检校官，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。开元十一年（公元 723 年）又在光顺门外置书院。开元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也置丽正书院。这就是说自开元五年至开元十二年（公元 717 年—公元 724 年）唐玄宗先后在乾元殿、光顺门外、明福门外三处置丽正书院抄书、修书和校书。

集贤书院，也称集贤殿书院。据《旧唐书·玄宗本纪》记载，开元十三年（公元 725 年）夏，改集仙殿为集贤殿，丽正书院改为集贤殿书院。随后，大明宫光顺门外、东都明福门外的丽正书院也改为集贤书院。

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的基本职能是修书、校书。其动机和目的重在显示唐代统治者崇儒问道的精神和功德，同时也表明唐代统治者继承和弘扬历史传统、以古鉴今的决心和善举。

起初唐玄宗的大臣名儒褚无量，认为内库旧书自唐高宗以来，一直藏在宫中，历时久远，逐渐丢失、损坏，奏请派专人缮写、刊校，以便弘扬经籍之道。这项建议深得玄宗赞同，遂令在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，大加搜写，并广采天下异本，进行刊校。经数年努力，四部经籍得以充

备。玄宗十分高兴，命褚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。

有一天，玄宗召集张说和礼官、学士等，赐宴于集仙殿。玄宗对张说讲：今天，朕与卿等众贤才同宴于此，宜改集仙殿为集贤殿。遂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，并命张说主持院事。很显然，集仙殿明显有道家、道教的意味，改为集贤殿表明了崇儒的精神。

有一次，中书舍人陆坚提出：集贤殿书院学士用人不当，而供俸太高，耗费过重，无益于国家，主张罢免众学士。张说听到后，公开予以驳斥，指出自古以来帝王功成之后，往往有骄奢自满之失。有的大兴池观，信佛奉道；有的迷恋声色，腐化堕落，耗财扰民。如今，皇帝崇儒问道，亲自讲论经籍，聘请众多豪俊之士；创置丽正书院，作为天子礼乐之所，所用费用极少，而所获益处却极大。陆坚之言，实无道理。玄宗得知，深信张说之言有理。陆坚由此而不再受重用了。

自西汉武帝以后，独尊儒术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普遍遵循的治国方略。收藏、整理经籍成为统治者尊孔崇儒的重要举措，也是统治者炫

耀功德的重要标志。搜集、收藏、刊校、整理经籍成为朝廷的一件大事，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。

唐玄宗创置丽正书院、集贤书院正是为了表明继承和弘扬历史传统，增强统治威力的决心。

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曾详细列举历代藏书、校书之事，以证明唐玄宗置丽正书院、集贤书院正是继承汉魏以来的历史传统，也表明丽正书院、集贤书院是由汉魏以来的秘书监、文德殿、文林馆、麒麟阁一类的官府藏书机构发展而来的，并具有类似的职能。

不过唐代的丽正书院、集贤书院较前代的藏书、校书机构职能有所扩展，新增了咨询、顾问、侍读、侍讲的职能。通过“刊缉古今之经籍，以辨明邦国之大典”；而备顾问应对“发现‘天下图书之遗逸，贤才之隐滞’”则上奏请求征集，“其有筹措之可施于时，著述之可行于代者，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”。据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“集贤殿书院注”称“唐玄宗”尝选耆儒，日一人侍读，以质史籍疑义”。大学士侯行果等曾侍讲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。侍讲后玄宗经常赐酒宴，学士与玄宗燕饮为乐，前后赋诗唱和，多得玄宗嘉赏。

《全唐诗》中保留了几首君臣酬和诗，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书院设置的确切时间和部分活动内容。唐玄宗的诗有一首是《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》，诗前有序，注明时间为“乙丑，开元十三年，三月二十七日”。还有一首为《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》，其前几句为：

广学开书院，崇儒行席珍。
集贤招袞职，论道命台臣。
礼乐沿今古，文章革旧新。
献酬尊俎列，宾主位班陈。

表明唐玄宗崇儒论道、继承古今礼乐，革新制度文章的心愿。

张说的和诗，也极力颂扬唐玄宗的功德。一首为《恩制赐食于丽正书院宴赋得林字》：

东壁图书府，西垣翰墨林。
诵诗闻国政，讲易见天心。

还有一首是《赴集贤院学士宴应制得辉字》：

侍帝金华讲，千龄道固稀。
位将贤士设，书共学徒归。

.....

欲知朝野庆，文章日光辉。

丽正书院、集贤书院作为为朝廷刊缉经籍，校理图书，征储贤才 侍读侍讲 承旨筹策 撰述待制，辨别邦国大典，以质史籍疑义而备顾问应对的馆阁，固然同聚徒讲学的书院有别，所以，它不是作为“士子肄业之所”的通常意义的教育组织。然而，唐代的丽正书院、集贤书院较汉魏以来的秘书监、文德殿、文林馆、麒麟阁一类的朝廷馆阁专为“修书之所”有所发展，增添了侍读侍讲，以质史籍疑义的新职能，不能不说它已步入宫廷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具备了特有的教育功能。特别是搜集、收藏图书，理校经书史籍，极大地启发了社会上一批读书士子利用藏书，在个人研读的基础上，发展成授徒讲学的教育新思路。因此，唐代官府创置的丽正书院、集贤书院，虽非士子肄业之所，但它对于书院教育发展无疑也产生了明显的诱发作用。

2 书院教育起于唐末五代

作为教育组织性质的书院起源于民间的私人聚书讲学活动。

私人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。从孔子首

创私学，到诸子百家率徒讲学，私学大盛，奠定了私人讲学的良好基础。秦代虽明令禁私学，而事实上私人讲学禁而不止，至汉代私人讲学更蓬勃兴起，并创立了私学的高级形式——精舍、精庐。杨荣春先生在《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》一书中说：“书院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。”陈登原先生在《中国文化史》一书中也说过：“在唐以前私人授学之所名曰精舍。谢承的《后汉书》云：‘陈实字仲弓归家立精舍讲授诸生数百人’，‘董春会稽余姚人。立精舍远方门徒从学者常数百人。诸生多升讲堂，鸣鼓三通，横经捧手请问者百人，追随上堂问难者百余人’，此即书院之前身。六朝以后，此风愈盛，僧道又各有精舍以授其徒。此盖书院之前身云。”

将汉魏以来的精舍或精庐看作是书院教育的“前身”这是很有见地的。一方面表明了书院教育是私人讲学悠久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汉魏以来的精舍或精庐，只是书院教育的“前身”，还不是唐末五代以后的书院教育本身。

书院教育的本质特征是私人藏书聚徒讲学。民间或私人具备藏书条件，构成书院教育产